

April 1998

Occasional Paper No. 78

3 1761 084200682



回歸後的香港青少年 公民意識

香港亞太研究所

王家英
沈國祥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m
679
W64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3

Gift from

HK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回歸後的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

王家英
沈國祥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沈國祥先生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

© 王家英 沈國祥 1998

ISBN 962-441-078-X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 錄

甲、前言	1
乙、調查目的	2
丙、研究範圍	2
丁、研究方法及設計	3
一、調查對象	3
二、調查形式與方法	3
三、抽樣	4
四、資料搜集	5
五、資料處理	5
戊、電話訪問資料分析	6
一、個人背景特徵	6
二、當前的公民意識狀況	8
1. 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知	8
2. 公民態度	11
3. 公民參與	15
三、對回歸後香港狀況的評估	19
四、身份認同、本位意識與對中國的態度	20
1. 香港本位意識	21
2. 對中國的態度	23
3. 身份認同、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的潛在矛盾	25
五、對回歸後公民教育的態度	31

己、深訪調查資料分析.....	36
一、個人背景特徵	36
二、公民意識狀況	39
三、對回歸的感受	42
四、對香港及中國的態度	44
五、對公民教育的態度	47
庚、結論	51
參考文獻	54

回歸後的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

甲、前言

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開始，香港的發展可說是進入了一個新紀元，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正式結束，香港成為一個在中國主權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特別行政區，並按《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式實行「高度自治」。由主權轉移而引起的種種對社會政治意識的衝擊，近年已為學界所關注，並出現了不少研究成果（Kuan and Lau, 1989；Lau, 1994；劉兆佳，1997；王家英、沈國祥，1996，1997）。在這轉變的過程中，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未來主人翁的青少年，他／她們的公民意識狀況如何？而面對回歸中國後的新政治形勢，他／她們又如何自處呢？

早於一九九五年香港正處於後過渡期的關鍵時刻，沙田區議會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就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狀況進行了首次調查，探討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狀況。一九九六年回歸前夕，小組又委託本研究所進行了第二次調查，重點放在青少年面對回歸在公民意識發展上可能遭遇的各種潛在問題。一九九七年本研究所繼續接受小組的委託，進行了第三次有關調查，除了嘗試捕捉期間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狀況的發展與變化外，更特別探討他／她們在回歸後如何對待公民教育的推行問題。一直以來，有關過渡期公民教育的研究多從推行者的角度作出考量，鮮有以受眾的角度作為分析的切入點，是次調查正好補充了這方面的不足，有平衡之效。

我們深深體會到香港由後過渡期最後階段到剛回歸中國這段時期社會意識變化的複雜性，故此希望通過持續的社會調查，對有關問題作出更深入的理解與掌握，並期望有關的研究對學術討論及具體公民教育政策的推展有所俾益。

乙、調查目的

是次調查的目的在於：

- (一) 在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有關後過渡期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調查的基礎上，繼續對回歸後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進行觀察，以瞭解其發展與變化；
- (二) 分析香港青少年的本土意識狀況、中國認同狀況及二者之間的關係；
- (三) 探討回歸後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教育態度及其與上述各變項的關係。

丙、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探討三大面向。其一是在回歸後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的狀況，範圍包括探討他／她們的公民意識在認知、態度和參與三個層面上的狀況和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她們對回歸後香港前景的態度。通過與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作比較，務求使我們能掌握九七回歸後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的狀況與變化。其二是在香港回歸中國後，香港青少年作為特區公民可能面對的問題，探討的範圍包括他／她們的本土意識、身份認同、對中國的態度，以及自由主義心態與國家民族理念的衝突等。此外，我們也會將有關結果與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比較，藉此釐清回歸前後有關問題的發展與變化。最後，調查會研究香港青少年對推行公民教育的態度，並結合上述各論題作相關分析，以

便進一步從青少年的角度探討回歸中國後在香港推行公民教育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困難。

丁、研究方法及設計

一、調查對象

我們的調查對象是香港青少年。這裏所謂的青少年，是指在調查訪問當天已年滿 15 歲（過了 15 歲生日）而又不超過 24 歲（未過 25 歲生日）的所有香港居民。將青少年定義於 15 歲至 24 歲之間，一方面是參考了過去有關調查的做法，再配合我們研究需要而作出的決定；另一方面是延續了我們過往兩年連續的調查，方便作比較分析之用。

二、調查形式與方法

是項調查的方法有二：其一為隨機抽樣的電話訪問調查（telephone survey）。問卷中的問題主要採用封閉式（即有預設性答案），但為了兼顧一些主觀性較強的問題，問卷中亦輔以開放式問題。其二為非隨機性小樣本深訪調查（in-depth interview）。

同時採取電話訪問調查與深訪面談方式進行研究，主要是兩種調查方法各有優勝劣弊，兩者兼用可收互補長短之效。大樣本的隨機抽樣電話訪問調查的優點在其樣本數大，較具代表性，而其隨機性質亦加強其作統計推論的可靠性。然而，電話訪問調查有其局限性，因為電話訪問一般只能應用於簡短的訪問，問題太多或太複雜皆不適宜，故此所得的結果只能適用於一般性的描述或分析。有鑑於此，九七年的調查加入一個小型的跟進調查（follow-up study），以深入面訪的方式對被訪者進行研究，然後將所得結果與電話訪問調查結果作相互補充的闡述。但是，由於每次深入面訪需時頗

長，不能輕易作大樣本隨機抽樣調查方式進行，所以較難作整體的推論。換言之，深入面訪的主要作用，是在大樣本隨機抽樣調查基礎上，對有關問題進行適當的補充及較深入的理解，而非作整體的推論，這一點是必須闡明的。

三、抽樣

大樣本電話訪問調查的抽樣方法現說明如下：先從最新的香港住宅電話簿（英文版）中隨機抽出若干電話號碼；為了使未刊載之住宅電話號碼也有機會被選中，我們將已抽選的電話號碼最後的兩個數字刪去，再配上由電腦產生的隨機數字，成為是次調查的全港性樣本。樣本電話號碼成功接通並確定了住戶中有年齡介乎 15 歲至 24 歲的青少年後，以出生日期選出其中一名為訪問對象。

至於小樣本的深訪調查，抽樣對象為於沙田區居住的青少年。選擇沙田區的考慮主要有三：（一）這是沙田區議會公民意識推廣及青少年事務工作小組委託進行的調查，選擇沙田區的青少年為訪問對象自然有其必須性及合理性；（二）在有限資源的限制下，在全港進行深訪調查極為困難，也沒有特別意義（並非隨機抽樣樣本，而樣本數也少，不能推論），而我們在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亦發現，沙田區青少年與全港青少年在人口特徵及態度上均沒有太大分別；（三）調查的組織工作集中在香港中文大學，在沙田區進行抽樣及訪問，對調查員及被訪者都較為方便（被訪者可選擇他／她們認為方便進行訪問的地方，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深訪調查的樣本來源有二：其一為電話訪問調查的被訪者，在進行電話訪問調查時，如得知被訪者是居住於沙田區後，調查員在訪問結束時會邀請他／她們作為跟進調查的訪問對象；其二，由於在電話上答應進行跟進調查的被訪者畢竟只是小數，而且後來在這有限的少數中，再因種種

原因拒絕接受深訪的也很多，因此為了達到起碼的樣本數，我們在已答應進行跟進調查的被訪者的個人特徵分佈的基礎上，進行選擇性的樣本補替。

四、資料搜集

電話調查於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進行，訪問時間主要為晚上六時至十時。調查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計劃負責執行，學生訪問員利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進行電話訪問，將被訪者的答案直接輸入電腦。在訪問正式進行之前，訪問員均會接受答問訓練，以預先熟習訪問期間所可能遭遇的各種問題。調查抽選和配置了總數 13,569 個電話號碼，成功確定住戶電話數目 6,301 個，當中無適當被訪者 4,012 個，拒絕接受訪問有 851 個（包括中途拒答），成功訪問樣本有 1,035 個，成功接觸住戶後的成功回應率為 54.9% ($1,035 \div (1,035 + 851)$)。

由於深訪面談的被訪者主要來自電話調查的自願被訪者，所以深訪面談是在電話訪問調查完成後的第一個月內進行。第一批深訪面談樣本來自電話訪問調查的自願被訪者。在電話訪問調查中一共有 114 位被訪者居住在沙田區，其中 31 位答應我們的跟進調查。其後我們依取得的地址發信邀請，最後有 14 位成功完成訪問。第二批深訪面談樣本為 convenient sample，以較快及針對性的邀請被訪者，這批被訪者共有 3 人。最後深訪面談的成功樣本合共有 17 人。

五、資料處理

所有電話訪問所得資料經小心校正和編碼後輸進電腦，再由統計軟件分析處理。在分析單變項的數據時主要根據百分比作出描述；分析雙變項時則以交互表（crosstabulation）或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探求變項之間的關係及其強

6 回歸後的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

弱，並經卡方測試（chi-square test）或兩端顯著度測試（two-tailed significance test）以鑒定顯著關係並非因隨機抽樣誤差所致。在分析時，我們嘗試盡量將是次調查結果與過往兩年進行的調查結果作出比較，以便得知有關問題的變化。

至於深訪面談調查部份，我們在先徵求被訪者的同意下對面談進行錄音，若被訪者不同意錄音則會即時對面談內容作出詳細筆錄。對於錄音的資料，我們會先移譯為文字，並與筆錄面談資料按每一被訪者編錄存檔，最後再按電話調查的分析架構作系統的分析、解讀和補充，以求能更深入地瞭解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狀況及其對公民教育的態度。

戊、電話訪問資料分析

一、個人背景特徵

表一列出了是次電話調查被訪者的個人背景特徵，共分六個方面：性別、年齡、出生地、居港年期、教育程度及在學／就業。

首先是性別方面。在 1,035 個成功被訪者中，男性有 537 人，女性有 498 人，分別佔總樣本人數的 51.9% 和 48.1%。據統計處出版的《一九九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所載，全港 15 至 24 歲人口中，男性佔 50.7%，女性佔 49.3%。換言之，是次調查的男性被訪者較全港的百分比稍多，而女性被訪者則較全港的百分比稍少。由於相差只有 1.2%，相信主要是由於抽樣誤差所造成。

年齡方面，18 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較 18 歲以上的被訪者為多，按一九九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的數據顯示，19 歲至 24 歲的年齡組較 15 歲至 18 歲為多，亦即是說，是次調查的 15 歲至 18 歲的人士，較具體情況為多。當中的可能原因，除了一般的抽樣誤差外，恐怕與年齡較大的青少年較少留在家中，

表一：被訪者個人背景特徵分佈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537	51.9
	女	498	48.1
	總計	1,035	100.0
年齡	15歲	137	13.3
	16歲	148	14.3
	17歲	134	13.0
	18歲	125	12.1
	19歲	99	9.6
	20歲	96	9.3
	21歲	70	6.8
	22歲	72	7.0
	23歲	77	7.5
	24歲	74	7.2
出生地	總計	1,032	100.1
	香港	885	85.8
	香港以外	146	14.2
非香港出生 的居港年期	總計	1,031	100.0
	十年或以下	67	46.2
	十年以上	78	53.8
教育程度	總計	145	100.0
	沒有受教育	1	0.1
	小學	7	0.7
	初中	121	11.8
	高中及預科	731	71.0
	大專或以上	169	16.4
在學／就業	總計	1,029	100.0
	在學	669	65.0
	就業	340	33.0
	沒有工作／待業／失業	21	2.0
	總計	1,030	100.0

不易為我們成功接觸訪問有關，這種情況在其他有關青少年的研究抽樣中亦常常遇到。

出生地方面，有 85.8% 的被訪者是在香港出生的，不是在香港出生的有 14.2%。在香港以外出生的被訪者而在港定居十年以上者則有 53.8%。換言之，在那些非香港出生的被訪者之中，亦有超過一半是居港超過十年以上的。

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已發現，隨著教育的普及，具中學以上程度的人口漸多，加上專上教育在過去數年亦急劇擴展，青少年的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是次調查也反映了這個情況。據表一所示，九成以上的被訪者具初中或以上教育程度，其中初中程度的有 11.8%，高中（包括預科）或工業學院程度的有 71.0%，而具大專或以上程度的亦有 16.4%。

從表一中亦可看到，在所有的電話被訪者中，有 65.0% 為學生，就業的有 33.0%，而沒有工作／待業／失業的只有 2.0%。

總括而言，我們的調查樣本的背景資料與人口統計的數據差別不大，故此我們對於是次調查的樣本，並沒有按人口統計的資料加權（weighting）以作出調整。

二、當前的公民意識狀況

我們探討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的方法，基本上按照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所設定的分析架構，即公民認知、公民態度和公民參與三個層面進行。

1. 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知

與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一樣，一九九七年的調查要求被訪者列出他／她們認為最重要的公民權利和責任，由於我們不試圖以一固定框架去限制被訪者對公民權責的主觀闡釋（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這樣較能提供更為豐富及多樣

的答案，但無可避免地會加重編碼的困難），所以發問的方式與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一樣，仍然採取開放式。結果列於表二。

表二的調查結果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在列舉出的最重要特區公民權利項目中，與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相似，自由／人權、民主權利／投票／選舉權這二項仍然是被大多數青少年認為是最重要的公民權利。尤其是自由／人權方面，有 51.1% 被訪者表示，作為特別行政區公

表二：被訪者認為作為特區公民最重要的公民權利（%）

最重要的公民權利	1997	1996	1995*
自由／人權	51.1	59.5	23.2
民主權利／投票／選舉權	9.4	7.3	21.8
享有各種福利的權利	2.4	2.2	2.7
享有安定／平穩生活的權利	0.4	—	—
享有現在擁有的權利	0.3	0.4	—
享有中國公民的權利	0.2	—	—
其他	0.4	0.2	1.2
沒有	—	—	1.2
不知道／很難說	35.9	30.5	50.0
(樣本數)	(1,034)	(1,300)	(1,641)

* 在一九九五年的調查中，有關問題只要求被訪者列出他／她們認為最重要的公民權利，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七年的調查則要求被訪者放在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的身份下考慮這個問題。

民最重要的公民權利是自由／人權方面的權利，雖然較一九九六年的調查減少了 8.4%，這個數字仍然是極為觸目的。這結果或多或少反映出自由／人權仍然是香港青少年在九七回歸後作為特區公民普遍關心的重要權利。一九九六的調查已指出，青少年如此重視自由／人權，主要是受到九七回歸後自由／人權可能減少的憂慮所影響。一九九七的調查顯示有關數字稍為回落，很可能由於回歸後香港的自由／人權並沒有受到預期的減損，故此有關的憂慮也略為紓緩。相反，認為民主權利／投票／選舉權及享有各種福利權利的被訪者均較一九九六年為多。排列第二位重要的民主權利／投票／選舉權，較一九九六年略為上升 2.1%，這也許是因為受到一九九八年將會進行首屆立法會選舉的影響所致。認為享有各種福利權利是最重要的公民權利的被訪者有 2.4%（若將享有安定／平穩生活的權利歸入，則有 2.8%），與一九九六年相若。至於作為特別行政區公民最重要的公民責任，有關結果列於表三。

表三顯示，一九九七年的調查結果與一九九六年調查結果甚為相似。最多被訪者回答的三項公民責任依次為遵守法律（18.8%）、做好自己本份（8.5%）和貢獻／服務社會／關心社區（5.5%）。一九九五年排首位而一九九六年排第三位的投票／選舉，一九九七年則下降至第四位（只有 5.1%）。認為遵守法律是最重要的公民責任的被訪者則在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七年這三年間逐年遞增，明顯地反映出對於作為特區的公民，香港青少年在公民責任的認識上更為突顯個人的層面（守法、做好本份），對政治範疇（尤指投票、選舉）的重視反而較為次要。這項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已注意到的發現，一九九七年得到進一步的確認。

表三：被訪者認為作為特區公民最重要的公民責任（%）

最重要的公民責任	1997	1996	1995
遵守法律	18.8	16.0	11.7
做好自己本份	8.5	10.9	2.4
貢獻／服務社會／關心社區	5.5	4.1	5.2
投票／選舉	5.1	7.4	20.0
交稅	4.7	2.0	4.6
撲滅罪行／維持治安	2.7	1.8	1.9
關心時事	1.6	2.5	1.6
清潔香港／環保	1.3	0.9	6.1
參與建設中國	1.3	0.5	—
保護自由人權的公平	1.3	1.9	—
監察政府／提出不同意見	1.2	0.8	—
維護平穩繁榮安定／不鬧事	0.9	1.9	—
協助／支持特區政府	0.5	0.5	—
認識中國	0.4	0.5	—
維護中國領土／愛中國	0.4	0.2	—
愛香港／不可破壞區旗	0.3	—	—
其他	0.3	0.2	1.6
不知道／很難說	45.3	48.0	44.8
(總人數)	(1,032)	(1,301)	(1,648)

2. 公民態度

對於公民態度，我們的重點為一般性的政治態度，問題與過去兩年的調查相若，目的在於捕捉香港青少年一般的政治態度的狀況與變化。

表四列舉出前後三次調查的一般性政治態度的結果。我們在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中已發現，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態度明顯是傾向於負面甚至帶點犬儒主義（cynicism）的味道，這些態度主要表現在對政治人物不信任；認為政治十分複雜，不易明白；以及對政府的政策感到沒有影響力等幾方面。表四發現，這種在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中已充份顯露的負面政治心態在一九九七年的調查中依然存在，並沒有因為香港回歸中國後而有很大的改善。從表四可看到，有 38.1%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的政治人物參政的目的主要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較一九九六年少 1.7%，較一九九五年少 0.5%），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有 37.8%（較一九九六年多 2.5%，較一九九五年多 10.4%）；有 82.4% 同意／十分同意「政治是很複雜的，不是那麼容易明白」（較一九九六年少 1.8%，較一九九五年多 10.8%），而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只有 11.9%（較一九九六年多 1.3%，較一九九五年少 4.0%）；有 54.1% 同意／十分同意「在香港，普通市民對政府的政策沒有甚麼影響力」（較一九九六年增加了 0.6%，較一九九五年則多 7.3%），而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有 37.5%（較一九九六年少 1.5%，較一九九五年多 2.7%）。這再次證明香港青少年的犬儒主義心態不僅有其穩定的結構，而這結構似乎出現了兩極化的傾向（「香港的政治人物參政的目的主要是爲了自己的利益」及「在香港，普通市民對政府的政策沒有甚麼影響力」兩個變項並沒有一面倒的情況，而同意及不同意者的比率均較一九九六年有所增加）。

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均顯示，香港青少年對投票乃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這一命題相當肯定。然而，對投票作用的肯定與民主的訴求又是否一樣呢？儘管香港未來的民主發展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決定，《基本

表四：被訪者的公共事務態度（%）

公共事務態度	1997	1996	1995
「香港的政治人物參政的目的主要是爲了自己的利益。」			
十分不同意	0.1	0.7	1.4
不同意	37.7	34.6	26.0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20.8	21.5	31.3
同意	34.5	36.6	33.6
十分同意	3.6	3.2	5.0
不知道／很難說	3.3	3.4	2.7
(樣本數)	(1,032)	(1,300)	(1,651)
「政治是很複雜的，不是那麼容易明白。」			
十分不同意	0.2	0.5	0.4
不同意	11.7	10.1	15.5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4.2	4.4	10.9
同意	76.6	79.4	60.4
十分同意	5.8	4.8	11.2
不知道／很難說	1.5	0.8	1.7
(樣本數)	(1,033)	(1,301)	(1,655)
「在香港，普通市民對政府的政策沒有甚麼影響力。」			
十分不同意	0.5	0.1	1.2
不同意	37.0	38.9	33.6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6.5	6.1	15.7
同意	50.8	51.3	42.6
十分同意	3.3	2.2	4.2
不知道／很難說	1.9	1.4	2.7
(樣本數)	(1,032)	(1,301)	(1,655)

表四：被訪者的公共事務態度（%）（續）

公共事務態度	1997	1996	1995
「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			
十分不同意	0.6	1.1	1.6
不同意	32.3	27.7	34.9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6.5	6.5	12.0
同意	55.8	62.3	45.3
十分同意	3.2	1.8	4.5
不知道／很難說	1.6	0.6	1.7
(樣本數)	(1,030)	(1,301)	(1,652)
「立法會中所有議席應該盡快由直選產生。」			
十分不同意	0.0	—	—
不同意	14.3	—	—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3.9	—	—
同意	71.6	—	—
十分同意	4.7	—	—
不知道／很難說	5.5	—	—
(樣本數)	(1,020)	—	—
「行政長官應該盡快由直選產生。」			
十分不同意	0.1	—	—
不同意	14.7	—	—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3.4	—	—
同意	72.9	—	—
十分同意	4.8	—	—
不知道／很難說	4.0	—	—
(樣本數)	(1,020)	—	—

法》已訂明民主步伐必須循序漸進，最終達致全民普選的目標，但是加快民主步伐的聲音在香港社會仍然沒有停止下來。其中，要求立法會所有議席應該盡快由直選產生及要求行政長官應該盡快由直選產生最具代表性。有鑑於此，在一九九七年的調查中，我們新增加了此兩項要求以瞭解青少年對香港民主步伐的態度。結果發現，分別有 76.3% 及 77.7%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立法會中所有議席應該盡快由直選產生」和「行政長官應該盡快由直選產生」，不同意／十分不同意分別只有 14.3% 及 14.8%（參看表四）。顯而易見，香港青少年對加快民主步伐的肯定是相當明確的。

3. 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主要分為兩大部份，其一為一般性的社會參與，包括對時事的關注程度、有否與別人討論時事問題、對社會義務工作的參與，以及對集體社會政治行動參與的頻度。其二為投票參與，包括過去有否投票及未來的投票意欲。

與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一樣，是次調查是以一個逐層遞增的方式來觀察香港青少年的公民參與狀況，也就是由參與成本（包括時間、知識、主動性等）較低而又最輕易做到的關心時事，到與人討論時事問題，到成本較高的社會義務工作參與，再到較為激烈的集體社會政治抗爭活動的參與。

在關心時事方面，我們向被訪者詢問了他／她們讀／聽／看新聞的頻次和實際與人討論時事問題的頻次。表五顯示，香港青少年對新聞時事仍頗為關心，回答經常讀／聽／看新聞的被訪者有 46.6%，而回答偶爾的則有 49.8%，表示完全對新聞時事不聞不問的僅有 3.7%。這種情況與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所得相近，但一九九七年較一九九六年

仍有輕微下降。整體而言，香港青少年對時事具有一定程度的關注。

表五：被訪者的公民參與情況（%）

公民參與	1997	1996	1995
讀／聽／看新聞的頻次			
完全沒有	3.7	1.5	2.2
偶爾	49.8	48.7	53.7
經常	46.6	49.7	44.1
(樣本數)	(1,035)	(1,303)	(1,660)
討論時事問題的頻次			
完全沒有	32.9	28.6	30.2
偶爾	62.6	65.8	64.1
經常	4.5	5.5	5.7
(樣本數)	(1,035)	(1,303)	(1,660)
參加義務工作的頻次			
完全沒有	68.5	64.3	61.9
偶爾	28.0	32.1	33.3
經常	3.5	3.6	4.8
(樣本數)	(1,034)	(1,303)	(1,660)
參加遊行或靜坐示威的頻次			
完全沒有	94.6	85.7	—
偶爾	5.3	14.1	—
經常	0.1	0.2	—
(樣本數)	(1,035)	(1,303)	—

至於與別人討論時事問題方面，在是次的調查中，有 62.6% 的被訪者表示偶爾與人討論時事問題，完全沒有的有 32.9%，表示經常的只有 4.5%。其分佈與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也十分相似，即大多數的香港青少年對時事的討論還是強差人意而已。此外，表示完全沒有與人討論時事問題的比例較一九九六年有所增加（4.3%），這個趨勢是值得未來的研究留意的。

在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中我們已發現，相對於對新聞時事的關注，香港青少年在具體的社會參與顯得並不積極。一九九七年的情況也是一樣，表示經常參與社區或社團的義務工作的被訪者只有 3.5%，表示偶爾參與的有 28.0%，表示完全沒有的卻多達 68.5%，分別較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五年增加 4.2% 和 6.6%。這種對社會參與持冷漠態度似乎有續年遞增的趨勢，值得未來進一步觀察。

因為香港社會日趨自由民主開放，集體社會政治行動日多，作為一種公民參與，其蘊含的社會政治意識亦最高（參與成本亦然）。一九九七年的調查仍保留了集體社會政治行動參與（即遊行集會的參與）的問題。表五指出，表示經常參加遊行或靜坐示威的被訪者佔極少數，只有 0.1%。表示完全沒有的佔絕大多數，有 94.6%，較一九九六年多 8.9%。以香港青少年較為負面及保守的公民態度，這結果實不足為奇。

至於投票參與，我們主要查詢被訪者過去在三級議會的投票經驗，但由於香港法例規定未滿 18 歲不能登記成為選民和不能投票，所以與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一樣，在處理 18 歲以下的被訪者時，我們主要探討他／她們未來的投票意欲。

首先是 18 歲或以上的被訪者。表六顯示，有 25.7% 的被訪者有議會投票的經驗，沒有的則有 74.0%。有投票經驗的

表六：十八歲或以上被訪者的議會投票參與 (%)

議會投票經驗	1997	1996	1995
沒有*	74.0	64.1	63.3
有	25.7	33.0	36.7
忘記	0.3	2.9	0.0
(樣本數)	(612)	(799)	(931)

* 包括沒有登記為選民的被訪者。

被訪者較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為低是可以理解的。過去最近的一次選舉是在一九九五年舉行，是次調查已年滿 18 歲的被訪者有不少在當時仍未有資格投票，因此投票參與減少應主要是由於時間所形成的落差所致。

既然投票參與由於選舉時間遠近的因素以致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對未來的投票意欲便顯得更為重要。對於 18 歲或以上的被訪者，當被問及他／她們會否於一九九八年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選舉中投票時，有一半的被訪者 (50.5%) 表示將會投票，約有四分之一表示不會 (23.5%)，另外四分之一 (26.0%) 表示考慮及尚未決定（參看表七）。相對於 18 歲或以上的被訪者，那些 18 歲以下的被訪者的投票意欲明顯強烈得多。有 76.6% 的被訪者表示年滿 18 歲後會在將來的選舉投票，表示不會及尚未決定的分別有 12.4% 和 11.0%。簡言之，香港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展現出較強烈的政治參與（特別是投票）意欲，但這種意欲較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已有所減弱（下降了 9.4%）。還須強調的是，正如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報告指出，這種投票意欲在將來會否變成具體行動仍然是未知之數，因為實在有太多外來因素影響投票傾

表七：被訪者的議會投票意欲（%）

議會投票意欲*	18 歲以下		18 歲或以上	
	1997	1996	1995	1997
不會	12.4	8.2	14.8	23.5
會	76.6	86.0	78.7	50.5
未決定／不知道	11.0	5.8	6.5	26.0
(樣本數)	(418)	(500)	(649)	(612)

* 18 歲以下被訪者的問題是「當你夠 18 歲時，你會唔會喺將來任何嘅選舉中投票呢？」；18 歲以上被訪者的問題是「你會唔會喺明年嘅立法會選舉中投票呢？」

向，例如投票制度的改變、政府的宣傳、政黨的動員與競爭，以及選舉期間有否重大事件的發生等，均會影響這些未來選民的投票意欲。

三、對回歸後香港狀況的評估

與之前的調查一樣，一九九七年的調查仍繼續詢問被訪者對九七回歸後香港未來狀況的評估，以瞭解他／她們對九七回歸的看法。表八分別臚列出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五年三次調查中被訪者對回歸後香港整體狀況的評估。一九九七年的數據顯示，有 64.4% 的被訪者認為回歸後的香港將會保持不變，較一九九六年多 8.8%，較一九九五年增加 5.2%；認為會更差的只有 9.4%，較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五年分別減少了 12.2% 及 13.3%；相反，認為香港會更好的則有 23.5%，較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五年分別增加了 6.2% 及 10.6%。就這三年的調查結果而言，整體上香港青少年對九七

表八：被訪者對回歸後香港狀況的估計（%）

對回歸後香港狀況的估計	1997	1996	1995
更差	9.4	21.6	22.7
一樣	64.4	55.6	59.2
更好	23.5	17.3	12.9
不知道／很難說	2.7	5.4	5.1
(樣本數)	(1,035)	(1,303)	(1,660)

回歸後香港的看法似乎已經從回歸前那種悲觀多於樂觀的情緒逐漸扭轉過來。事實上，先前預計可能於回歸前後發生的動盪（大規模移民、自由倒退、經濟崩潰等）並未有出現，這應有助平抑他／她們的有關憂慮。回歸後多項民意調查均顯示，市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漸次恢復，¹ 我們是次的調查可以說進一步反映了這個趨勢。

四、身份認同、本位意識與對中國的態度

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中港兩地生活及文化始終存在著一定的疏離關係。這種疏離關係有其複雜的歷史及政治因素背景（一九九六年的報告對此已有所簡述），包括長時期英國殖民地統治造成香港獨特的社會形態、國內政局長期動盪、中港兩地長期區隔、戰後第二代港

¹ 可參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在回歸後每月為《蘋果日報》所做的有關民意調查。

人本土意識的興起等等（劉兆佳，1997；王家英，1996，1997；Wong, 1996）。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本土意識的興起與伴隨著香港回歸中國而必然帶來的民族國家理念的再植人（主要體現在對公民意識的推展上）會否出現某種緊張關係呢？對香港未來與中國的整合又會帶來怎樣的難題呢？我們在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已經開始捕捉這方面的趨勢。

1. 香港本位意識

這裏所謂香港本土意識，是指一種傾向以香港作為中心的心態，一方面對香港的發展相當滿意，進而認為香港較中國大陸優越，另一方面香港本土意識推衍出的歸屬感又強調香港利益優先，故又稱香港本位意識。一九九六年的結果已顯示，香港青少年的香港本位意識極為明顯。一九九七年的調查仍見到這種情況。表九透露，在一九九七年的調查中，有 70.7%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的制度相當完善，因此中國要發展，應該多些學習香港的制度」，較一九九六年少 6.6%；表示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則有 20.2%，較一九九六年多 7.7%。另外，有 81.4%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人自己有能力管理好香港」，較一九九六年增加 7.9%；表示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則有 12.5%，較一九九六年少 6.4%。至於「當中國的利益與香港的利益出現衝突時，應該先考慮香港的利益」，有 67.0% 同意／十分同意這種講法，較一九九六年少 6.7%，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則有 22.1%，較一九九六年增加 6.8%。

以上的結果反映出香港青少年的香港本位意識仍然極為強烈，但一些輕微的轉變還是不難覺察得到的。一方面，香港制度優勝及香港利益優先的意識稍為下降，顯示出本位優越心態的「香港本位意識」在回歸中國後有退減的現象，這個變化究竟是結構性的趨勢還是偶發性因素所致尚不清

表九：被訪者的香港本位意識（%）

香港本位意識	1997	1996
「香港的制度相當完善，因此中國要發展，應該多些學習香港的制度。」		
十分不同意	0.2	0.2
不同意	20.0	12.3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7.7	8.2
同意	67.3	72.8
十分同意	3.4	4.5
不知道／很難說	1.4	2.0
(樣本數)	(1,023)	(1,301)
「香港人自己有足夠能力管理好香港。」		
十分不同意	0.1	0.3
不同意	12.4	18.6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4.3	5.8
同意	76.9	70.7
十分同意	4.5	2.8
不知道／很難說	1.9	1.8
(樣本數)	(1,024)	(1,300)
「當中國的利益與香港的利益出現衝突時，應該先考慮香港的利益。」		
十分不同意	0.1	0.5
不同意	22.0	14.8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6.9	9.6
同意	64.1	71.5
十分同意	2.9	2.2
不知道／很難說	3.9	1.3
(樣本數)	(1,023)	(1,300)

楚，因為調查進行期間香港經濟出現大幅波動，相反中國則相對平穩，這或會令不少香港人對以往一向引以為傲的制度開始有所保留。另一方面，認為香港人有能力治理好香港的被訪者比例卻有上升的態勢，如果結合上文討論公民態度中有關對民主步伐的肯定這個狀況，則我們也許有這樣的印象：香港回歸的事實有助減低香港青少年「香港本位意識」中本位優越心態的一面，但是對香港回歸仍心存憂慮，故仍特別強調民主、自由、自治，以減少中國對香港的可能干預。

2. 對中國的態度

香港人的本位意識既具有以香港作為中心的心態，從另一方面的體認自然很容易會對中國產生某種相對負面的態度，從而對中國大陸存在了不同程度的疏離意識。一九九六及一九九五年的調查均發現，儘管香港青少年本位意識濃厚，但他／她們對中國的疏離意識並不強，大部份仍然贊同加強中港溝通、加強香港的民族教育，並對中國歷史文化作出正面的評價。然而，由於調查設計的限制，上述的結論只顯示出香港青少年在廣義的歷史文化層面上沒有出現疏離意識，對非歷史文化層面特別是政治層面上的意識及認同問題卻沒有探討。這是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調查的不足之處。為此，一九九七年的調查特別加入關於中國政治態度的問題，嘗試更深入地探討香港青少年對中國態度的複雜性與多面性。

首先是有關參與中國發展的問題。表十顯示，有 77.8%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香港人應該多些參與幫助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較一九九六年少 3.2%，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則有 11.5%，較一九九六年多 2.8%。簡言之，反對港人多參與幫助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人有些微上升的

表十：被訪者的中國態度（%）

中國態度	1997	1996
「香港人應該多些參與幫助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		
十分不同意	0.2	0.2
不同意	11.3	8.5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8.2	8.1
同意	74.8	78.5
十分同意	3.0	2.5
不知道／很難說	2.5	2.2
(樣本數)	(1,029)	(1,299)
「中國政府值得信任。」		
十分不同意	1.7	—
不同意	37.8	—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19.8	—
同意	35.5	—
十分同意	0.4	—
不知道／很難說	4.9	—
(樣本數)	(1,017)	—
「中國現在的民主自由狀況令人滿意。」		
十分不同意	4.1	—
不同意	66.3	—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12.0	—
同意	15.1	—
十分同意	0.2	—
不知道／很難說	2.3	—
(樣本數)	(1,019)	—

趨勢。在一九九七年新增的兩條關於中國態度的問題當中，有 35.9% 的被訪者同意／十分同意「中國政府值得信任」這個說法，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的亦有 39.5%。雖然對中國政府不信任較信任稍多，並沒有出現一面倒的情況，可見香港青少年對中國政府的信任感是頗為分歧的。對於「中國現在的民主自由狀況令人滿意」，有 70.4% 的被訪者不同意／十分不同意這個說法，同意／十分同意只有 15.3%。這結果非常清晰，也就是大多數的被訪者認為中國現在的民主自由狀況尚不能稱為滿意，可見香港的青少年對中國的政治狀況仍存有頗嚴重的負面看法。

3. 身份認同、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的潛在矛盾

香港本位意識除了表現於中港之間在文化、制度、經濟發展、政治狀況的不同認知外，也同時表現在身份認同的差異上。此外，香港充滿自由主義色彩的本位意識與因回歸中國而衍生出的民族主義之間更可能存在著某種內在的張力，從而形成香港回歸中國後中港之間的潛在矛盾。尤其是後者，它是我們一九九六年調查的重點之一。一九九七年的調查結果怎樣？相對於一九九六年又有沒有出現變化？

首先是身份認同問題。表十一顯示，當被訪者被問及其身份時，有 66.6% 的被訪者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較一九九六年增加 4.1%；相反，表示自己是中國人的有 27.3%，較一九九六年少 2.7%。從這些數字看，香港青少年認同香港的心態仍十分明顯，不僅未因香港已經回歸中國而有所減少，而且這種認同似乎還有上升的趨勢。

在上文討論公民權利時已發現，無論是在處於後過渡時期港英統治下的香港，還是剛剛回歸中國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自由人權依然是青年人認為最重要的公民權利。香港人的個人主義一向強烈，由此而衍生的自由人權意識（雖然這

表十一：被訪者的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	1997	1996
香港人	66.6	62.5
中國人	27.3	30.0
兩者皆是	5.0	6.6
兩者皆不是	—	0.1
不知道／很難說	1.1	0.8
(樣本數)	(1,035)	(1,303)

意識主要是建基於個人免受限制的消極自由觀，而非強調參與社會、建設社會，故此未能突顯出自由主義作為內在價值的積極面），似乎亦已深深根植於香港青少年的重要公民價值觀之內。

不過，香港畢竟已經回歸中國，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區公民，香港人未來的公民意識自然必須面對如何與國家民族整合的問題。以往在殖民地教育及文化政策下的非民族國家化現象勢必改變。雖然如此，現實的發展自有其特定的內在軌跡，在政治的新舊交替中，強調個人的自由人權，與強調社群的國家民族觀念，在香港的青少年心目中有沒有矛盾呢？一九九六年的調查已對有關問題作出首次的探討，主要向被訪者詢問維護自由人權及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取捨問題，一九九七年的調查繼續詢問了這方面的問題。從表十二可以見到，在一九九七年的調查中，有 74.4% 的被訪者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國家民族利益重要，較一九九六年多 8.2%；認為國家民族利益較重要的則有 15.5%，較一九九六年少

表十二：維護個人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利益的取捨（%）

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孰重孰輕	1997	1996
自由人權較重要	74.4	66.2
國家民族較重要	15.5	18.5
兩者皆重要	8.2	12.0
不知道／很難說	1.8	3.3
(樣本數)	(1,032)	(1,303)

3.0%。綜合兩年的發現，我們可以看見，香港青少年在維護自由人權及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取捨問題上明顯地傾向前者，而在香港回歸中國後，這趨勢不減反增。

如上所說，香港青少年的本位意識具有濃厚的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色彩，以下我們將身份認同與自由人權／國家民族進行了交互分析，並對比一九九六年的數據，結果列於表十三（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將身份認同中只認同香港人及只認同中國人的被訪者，與只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重要及只認為國家民族利益較重要的被訪者，進行交互分析）。一九九六年的結果已顯示，認同香港人較認同中國人的被訪者有較強烈的自由人權價值觀念；相反，認同中國人較認同香港人的被訪者有較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這種差異在卡方測試下呈現顯著的關係。一九九七年的結果極為相似，認同香港人的被訪者中有 88.4% 同時認為自由人權較重要，認同中國人的則有 69.2%；相反，認同香港人的被訪者中只有 11.6% 認為國家民族較重要，認同中國人的卻有 30.8%。而這種差異在卡方測試下亦同樣呈現顯著的關係。若比較兩年的卡方值，

表十三：身份認同與自由人權／國家民族（%）

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	身份認同			
	1997		1996	
	香港人	中國人	香港人	中國人
自由人權較重要	88.4	69.2	85.6	63.2
國家民族較重要	11.6	30.8	14.4	36.8
(樣本數)	(646)	(237)	(715)	(323)
	$(\chi^2 = 45.774; df = 1; p < 0.01)$		$(\chi^2 = 66.615; df = 1; p < 0.01)$	

九七年的明顯更大，反映有關的關係有所強化。無論如何，連續兩年均出現相同的結果可以再次確認這樣的情況：香港青少年的香港人認同確實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色彩，而這種認同明顯地與當前中國的國家民族意識及現實政治狀況存有某種程度的內在矛盾。

與此同時，究竟不同個人背景因素與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的態度有否存在關係呢？表十四的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性別與身份認同存有顯著的負關係，即女性較男性傾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但性別與自由人權／國家民族卻沒有呈現顯著的關係，表示男女性別對自由人權／國家民族的態度頗一致。年齡、教育及在學與否與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的態度均沒有呈現顯著的關係，反映出不論年齡大小、教育程度高低及在學與否，對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的態度的影響不大。較值得注意的是出生地，這變項與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的態度皆存有顯著的正關係，即在香港出生的被訪者較非在港出生的被訪者傾向認

同自己是香港人，亦傾向認為自由人權較民族國家來得重要。從相反的角度看，鑑於大部份非香港出生人士皆來自中國大陸，而他／她們所受的社會政治教化與香港的殖民地教育自然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青少年在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態度上有異於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少年。

那麼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香港本位意識及中國態度又有沒有關係呢？為此我們進行了另一項相關分析，以釐清它們之間的關係。表十五顯示，傾向認同香港的青少年與香港本位意識存在著某種的相關性。身份認同與「港人治港能力」及「香港利益優先」兩種態度均呈現顯著的正關係，表示越傾向認同香港的青少年，越肯定港人的自治能力，以及越認為當中港出現利益矛盾時，應先考慮香港的利益。然而，身份認同與「中國應學習香港」及「中國自由民主狀況令人滿意」兩種態度並沒有呈現顯著的關係，顯示出不管認同香港或中國與否，對「中國應學習香港」及「中國自由民主狀況令人滿意」的態度並沒有特別的影響。

至於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香港本位意識、中國態度的關係，除了「中國應學習香港」外，所有態度變項均呈現顯著的關係，其中與「港人治港能力」及「香港利益優先」兩種態度均呈現顯著的正關係，而與「港人應幫助大陸發展」、「中國政府值得信任」及「中國自由民主狀況令人滿意」則皆呈現顯著的負關係。有關結果表示了越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維護國家民族利益重要的青少年，越同意港人有治港能力及越強調香港利益優先，同時越不贊同港人應多參與幫助大陸發展、越不信任中國政府，以及傾向不認為中國現時自由民主狀況令人滿意。

大體而言，傾向認同香港及較強調自由主義的青少年，其香港本位意識（除了「中國應學習香港」外）較強，對中

表十四：被訪者個人背景特徵與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個人背景	身份認同 ¹	自由人權／國家民族 ²
性別 (女=0；男=1)	-0.1088**	-0.0232
年齡 (15-24)	-0.0301	-0.0405
出生地 (非香港=0；香港=1)	0.2877**	0.1269**
教育 (由小學或以下至大學或以上)	0.0222	-0.0287
在學／就業 (就業=0；在學=1)	-0.0285	-0.0241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1。

1 身份認同：香港人 = 1；中國人 = 0，下同。

2 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自由人權較重要 = 1；國家民族較重要 = 0，下同。

表十五：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香港本位意識及中國態度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香港本位意識、中國態度 ¹	身份認同	自由人權／國家民族
中國應學習香港	0.0363	0.0216
港人治港能力	0.0763*	0.0756*
香港利益優先	0.1417**	0.1327**
港人應幫助大陸發展	-0.1194**	-0.1118**
中國政府值得信任	-0.1972**	-0.1756**
中國自由民主狀況令人滿意	-0.0406	-0.1076**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1。

1 所有態度問題中的「不知道／很難說」都被視為缺值 (missing value)，不在計算之內，下同。

國的態度亦傾向負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認為香港制度較中國優勝從而認為中國應向香港學習的青少年有所減少，似乎意味香港回歸的事實有助減低香港青少年「香港本位意識」中本位優越心態的一面，但他／她們對香港回歸仍心存憂慮，故仍特別強調民主、自由、自治。

五、對回歸後公民教育的態度

隨著香港回歸中國，香港已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下享有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由於政治形勢的改變，公民教育問題再次成為教育界及社會人士關注的課題。在香港，公民教育一向被人忽視，一些教育社會學者指出這是英國殖民地統治的自然結果，因為在殖民統治下，所謂「公民教育」只能是「非政治」、「非民族」的「疏離的子民式政治文化」（曾榮光，1994，1995）。然而，九七回歸問題的浮現使公民教育開始受到社會所關注，而教育署也於一九八五年發表了《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到了一九九六年新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亦正式公佈，顯示政府及公眾對香港推行公民教育的重視。雖然如此，也許當時香港仍處於中英過渡期的政爭旋渦之中，有關的指引對香港公民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沒有作出明確的定位，故香港公民教育仍常被人詬病為目標不明確、推行不力。隨著香港回歸的逐步明朗化，關於公民教育發展的爭議有增無減，而爭議的焦點主要涉及公民教育的重點與取向。² 稍有不足的是，

² 其實，是次爭論的層面還包括如何推展公民教育的具體問題，例如應否設立獨立的公民科、獨立的公民科應是綜合性的還是針對性的、公民教育所涵蓋的範圍等等。由於爭論集中於如何在學校推行公民教育，而本調查所指的公民教育則

有關爭議多從推行者的角度討論問題，鮮有從受眾也就是青少年的感受為著眼點。為此，我們在一九九七年的調查中特別設計了若干問題去探討青少年對公民教育的態度。這些問題大多來自回歸前幾年間教育界及社會人士就有關回歸後公民教育重點與取向的討論的代表性意見，³ 這包括：「加強對基本法的認識」、「加強對普通話的推廣」、「加強民族教育」、「加強對中國的認識」、「加強培養對中國的歸屬感」、「全面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和唱國歌」、「增加中港學生之間的交流活動」、「加強對香港的認識」、「加強培養對香港的歸屬感」、「加強對自由人權的認識」，及「加強培養對不同意見的批判能力」。由 1 分代表最不重要至 5 分代表最重要，我們詢問了被訪者對這些提議的重要性的評價，其結果列於表十六。

從表十六可看到這些建議在被訪者心目中的相對重要性。首先，獲得最高分的前四項皆屬於本地認同與自由民主教育，而其中又以「加強對自由人權的認識」得到最高分（平均分為 4.15）。「加強對普通話的推廣」及「加強對基本法的認識」則排列在中間位置。至於有關加強國家認同、民族教育的建議，除了「加強對中國的認識」得分較高而排列較前外，全部得分皆較低。其中，「加強民族教育」有 3.30 分，「加強培養對中國的歸屬感」有 3.29 分，而「全面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和唱國歌」更只有 2.39 分。有關數據充份

包含整個社會，所以我們在設計問題時有意識地偏重於一般性的公民教育內容及取向。

³ 主要參考自一九九五年一月至一九九七年七月各期《教育資訊：每月教育資料剪輯》（香港教育聯會出版）中有關公民教育消息的剪報。

表十六：對公民教育工作項目重要性的評分

各項加強公民教育工作的建議	平均分*	標準差	樣本數
加強對自由人權的認識	4.15	0.96	1,029
加強對香港的認識	3.96	0.99	1,029
加強培養對不同意見的批判能力	3.92	1.05	1,022
加強培養對香港的歸屬感	3.87	1.03	1,030
加強對中國的認識	3.74	1.04	1,027
加強對普通話的推廣	3.65	1.10	1,029
加強對基本法的認識	3.57	0.94	1,024
增加中港學生之間的交流活動	3.46	1.05	1,029
加強民族教育	3.30	1.09	1,026
加強培養對中國的歸屬感	3.29	1.13	1,026
全面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和唱國歌	2.39	1.15	1,030

* 1分代表最不重要至5分代表最重要，下同。

反映出在香港青少年的心目中，加強對自由人權的認識、加強香港的認同及增強思想上的批判能力等項目，遠較加強中國的認同、加強民族教育等來得重要，而對具體的國家符號認同教育如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和唱國歌更存有最多的保留。

我們又將香港本位意識、對中國態度與公民教育態度進行了相關分析（表十七），試圖查證它們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港人應幫助大陸發展」、「中國政府值得信任」和「中國自由民主令人滿意」這些有關中國態度的變項與公民教育中有關國家民族的變項，如「加強對普通話的推廣」、「加強民族教育」、「加強對中國的認識」、「加強培養對

表十七：被訪者個人背景特徵與公民教育態度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對各公民教育工作重要性評分	中國應學習香港制度	港人有治港能力	香港利益優先	港人應幫助大陸發展	中國政府值得信任	中國自由主令人滿意
加強對基本法的認識	-0.0646*	0.0486	-0.0676*	0.0779*	0.0338	-0.0181
加強對普通話的推廣	-0.0650*	0.0029	0.0043	0.0876**	0.0778*	0.0720*
加強民族教育	-0.0333	-0.0073	-0.0893**	0.1175**	0.0760*	0.0222
加強對中國的認識	-0.0378	-0.0793*	-0.1127**	0.1326**	0.1383**	0.0488
加強培養對中國的歸屬感	-0.0364	-0.0266	-0.0983**	0.1325**	0.1836**	0.0893**
全面在校推廣掛國旗唱國歌	0.0047	-0.0077	-0.0594	0.1159**	0.1575**	0.1024**
增加中港學生之間的交流活動	-0.0252	-0.0383	-0.0778*	0.1659**	0.0935**	0.0296
加強對香港的認識	0.0097	0.0133	-0.0055	-0.0026	0.0077	0.0191
加強培養對香港的歸屬感	0.0393	0.0326	0.0469	0.0207	-0.0014	0.0379
加強對自由人權的認識	0.0133	-0.0026	0.0514	-0.0008	-0.0811*	-0.0351
加強培養對不同意見批判能力	-0.0354	0.0260	0.0482	-0.0280	-0.0745*	-0.0847**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1。

中國的歸屬感」、「全面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唱國歌」及「增加中港學生之間的交流活動」等大多呈現正相關，顯示那些對中國持正面態度（如同意中國政府是值得信任、中國現在的自由民主狀況令人滿意）的被訪者較為重視公民教育中的國家民族教育工作。

至於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公民教育態度的關係，可見於表十八的相關分析。綜合而言，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對「加強對基本法的認識」、「加強對普通話的推廣」、「加強對香港的認識」、「加強培養對香港的歸屬感」，以及「加強培養對不同意見的批判能力」等非涉及國家民族教育的變項均不呈現顯著的關係，反映出不同的身份認同及不同的自由人權／國家民族態度對以上那些公民教育建議的影響不大。主要的影響在於那些涉及國家民族教育的變項上，例如「加強民族教育」、「加強對中國的認識」、「加強培養對中國的歸屬感」和「全面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唱國歌」，均與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存有顯著的負關係，表示越認同香港或越強調自由人權的被訪者，越不認為需要加強民族教育、加強對中國的認識、加強培養對中國的歸屬感、全面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唱國歌等公民教育工作。這個發現從側面反映出香港青少年對國家民族取向較重的公民教育仍然存有一定的疑慮，而這又與香港青少年較傾向認同香港及較重視自由人權有很大的關係。基於這發現，對於那些強調回歸後應加強國家民族教育（甚或愛國教育）的人士，在真正推行公民教育時，必須對有關發現多加注意及作出妥善回應，若然只罔顧現實地強行向青少年推行他／她們不以為然的公民教育，徒增加他／她們的反感，甚至會引起不必要的抗拒。

表十八：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與公民教育態度的相關分析（相關係數）

對各公民教育工作重要性評分	身份認同	自由人權／國家民族
加強對基本法的認識	-0.0468	-0.0310
加強對普通話的推廣	-0.0626	-0.0480
加強民族教育	-0.1135**	-0.1617**
加強對中國的認識	-0.1733**	-0.1818**
加強培養對中國的歸屬感	-0.2138**	-0.1781**
全面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唱國歌	-0.1665**	-0.1273**
增加中港學生之間的交流活動	-0.0935**	-0.0229
加強對香港的認識	0.0239	0.0191
加強培養對香港的歸屬感	0.0370	0.0446
加強對自由人權的認識	0.0078	0.1533**
加強培養對不同意見的批判能力	-0.0192	0.0297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5；

** 者表示經兩端檢驗顯著度小於 0.01。

己、深訪調查資料分析

此部份的調查分析，主要以深訪調查方法取得的資料作為對上述的電話調查結果，作相互補充的闡述之用。

一、個人背景特徵

如早前所述，深訪面談總共成功訪問了 17 位被訪者。為了個人資料的保密，現將所有被訪者分別冠以英文字母代號，並將其個人背景特徵經整理後編列於表十九。

表十九：深訪個案背景資料

編號	稱呼	性別	年齡	工作或在學／出生地	社會／社團參與經驗	
					現為學校女童軍，曾參加暑期義工訓練班	完全沒有
1	A 同學	女	16	中六文科學生，香港出生	完全沒有	
2	B 同學	男	15	中四文科學生，香港出生	完全沒有	
3	C 同學	男	19	中文大學一年級學生，香港出生	中學時代完全沒有，現正被邀請加入籌組系會	
4	D 小姐	女	19	中五畢業，現職律師樓文員，香港出生	完全沒有	
5	E 先生	男	18	中四程度，現職清潔公司，香港出生	完全沒有	
6	F 同學	女	18	中六理科學生，香港出生	學校環保學會、班會	
7	G 同學	女	23	城市大學三年級學生，香港出生	完全沒有	
8	H 同學	女	23	教育學院二年級學生，香港出生	中學時曾參與少年警訊、女童軍、辯論隊、時事學會等	
9	I 小姐	女	19	中五畢業，現職貿易公司文員，香港出生	完全沒有	
10	J 同學	女	18	工業學院一年班學生，香港出生	中學時代為女童軍，現在社區中心當老人服務義工	

表十九：深訪個案背景資料（續）

	編號	稱呼	性別	年齡	工作或在學／出生地	社會／社團參與經驗
11	K小姐	女	24	大學畢業，現職實習醫生，香港出生	中學時代會做義工，大學時代為學生會秘書	
12	L同學	男	20	理工大學一年級學生，香港出生	會參與明星足球隊義賣、社區中心探訪老人的義務工作等	
13	M同學	女	20	理工大學二年級學生，香港出生	完全沒有	
14	N同學	女	17	中五理科重讀生，香港出生	會參加校隊，現在完全沒有	
15	O先生	男	21	工業學院畢業，現職社團幹事，香港出生	社會參與經驗豐富，曾為工業學院學生會幹事，也曾參與助選工作，現為區議會屬下委員會義工	
16	P同學	女	17	廣州出生及受教育，來港只兩年，先入讀中二，由於成績優異跳讀中四文科	完全沒有	
17	Q先生	男	22	預科畢業，保險經紀，香港出生	完全沒有	

在整個深訪面談樣本中，女性較男性為多，17位被訪者中只有6人是男性，其餘為女性。11人為學生，其中6人為中學生（包括1人為工業學院學生），5人為大專院校學生。已出來工作的被訪者有6人。除了1位被訪者是在中國大陸的廣州出生及受教育外，全部均在香港出生（見表十九）。

二、公民意識狀況

首先是公民參與方面。我們在電話調查時發現香港青少年對新聞時事表現出頗高的關注，但在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上則顯得有點裹足不前。當我們在深訪面談中再仔細詢問有關情況時，發現大多數被訪者確實對新聞頗為留意，差不多所有的被訪者都有每日接觸新聞的習慣，其途徑主要是電視，讀報紙及收聽電台新聞的被訪者反而較少。然而，我們同時發現，一半以上的被訪者其實並非主動收看新聞的，而是因家人收看而順便收看，更有被訪者（例如中四的B同學及大學三年班的G同學）坦言只留意新聞中有關劫案、謀殺等消息，但對政治及選舉等新聞則視若無睹。事實上，當我們追問被訪者有否收看其他時事節目時，反應只屬一般；而時常收看時事節目的被訪者大都離不開收看「議事論事」、「頭條新聞」、「傳媒春秋」等港台節目。

至於社會或社區參與，與電話調查的結果十分接近，除了其中一位被訪者（O先生）的社會或社區參與異常積極外，其他都只是一般，而現在有或曾經有社會或社區參與的被訪者大都只能舉出在學校參與的課外活動（童軍、學社等），有真正的社會或社區參與經驗的只是少數。家長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亦很小，除了一位被訪者（P同學）說是父親鼓勵她多看時事節目外，大多數家長並沒有在這方面給予被訪者任何積極的鼓勵。此外，家長也很少與被訪者討論時

事問題，而被訪者舉出的時事問題亦多屬民生事件（例如安寧花園事件、八佰伴倒閉事件），鮮有涉及政治問題。

至於公民態度，如前面所分析，電話調查的結果顯示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態度大都傾向消極負面及犬儒心態，主要表現在對政治人物參政的不信任、認為政治十分複雜難明及對政府的政策感到沒有影響力。我們在深訪調查中對此作出深入的探討。

首先是對政治人物參政的不信任方面。一般而言，深訪面談的被訪者大都同意政治人物參政的目的是為了自身利益多於大眾利益，又或是公私參半。不過，當我們追問可否具體舉出一些例子時，他／她們大都舉出臨時立法會議員、參選人大人士、親中人士等，但被訪者大都只能大概言之，對具體名字卻不甚了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列舉民主派政黨（民主黨／前線）或人士（司徒華／李柱銘／劉慧卿）是否也是為了自己利益時，被訪者的反應卻較為正面，也較少懷疑他／她們存有「私心」。雖然如此，以上的感受還是離不開表面的觀感，大部份被訪者對政治人物、政黨等皆欠缺深度的認識。相對而言，O先生的意見便顯得較為特別，這可能是因為他有豐富的社會參與經驗，亦有作過區議員辦事處的義工，對參政人物的一言一行頗有直接的親身感受。他認為一般人對政治人物參政的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他個人亦親身見過一些參政人物確實會為了個人的利益（為了選舉成功）而改變了原來的立場。

電話調查也指出香港青少年普遍認為政治十分複雜難明及對政府的政策感到沒有影響力。深談調查的結果基本上肯定了這個結論。例如當被問及是否覺得香港人普遍對政治冷漠時，H同學的回答可說是典型的代表：

這麼說也對，我也是這樣。（我們追問原因）有些跟自己的利益有關的重要問題，譬如要「搵錢」，使人

沒有甚麼時間顧及這些事（指政治），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人真的熱心，但那些不熱心的人主要是因為本身認識不足，不知道自己的公民權利或利益，對很多事情又不瞭解那麼多。

對於投票參與意欲，與電話調查的被訪者相若，大多數深訪調查的被訪者也表示在一九九八年或在滿十八歲後會投票。但我們與被訪者談論到這類問題時發現一些頗為有趣的觀點。有數位被訪者表示自己政治意識低、不理時事，但又表示一定會投票，而當我們為此追問他／她們的原因時，發現原來他／她們認為投票不等於政治參與。Q 先生便有如下的見解：

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不足，一心只顧「搵錢」，不講政治，我也一樣。（我們問甚麼是「政治」）政治是權力爭奪，不容易知道，好多時「好污糟」。（我們再問甚麼活動是「政治活動」）甚麼是政治活動？示威、遊行等吧！（我們問會否投票及原因）投票，一定會，但投票並不是政治活動呀。

但其他一些被訪者對於政治冷感的問題有另一番意見，例如 A 同學的回應：

香港人確實有政治冷感，不想參與，但沒辦法，參與亦無補於事，臨時立……（我們作提示）臨時立法會都不是市民選的……（我們問如果立法會全部直選，由市民選出來又怎樣）這將完全不一樣，將有很多人參與，投票率都會高些。

曾有助選經驗的 O 先生則認為：

說香港人是政治冷感又不完全對……不少年青人的政治意識也很高……（他又舉出一些助選經驗，認為參與不一定代表有意義的參與）。記得幫 XXX 助選時，許多老人家一車一車的到來投票，但他們投票時

其實非常盲目，完全因為關係而投票。……不參與有時也可理解，因為你會發覺參不參與都改變不了現實。

上述被訪者的談話無疑給「政治冷感」作出了深刻的解構。這是前面的電話調查所未能顯示的：參與高低不容易衡量，現實環境（尤其是宏觀政治環境）的強大制約，令不少人感到無能為力。冷感、參與低可能不是「果」，而只是「因」。既然知道參與（投票等）或表達意見後的結果只是徒然的，又怎能要求他／她們熱心參與和表達呢。劉兆佳和關信基（1995:74）研究香港人的政治參與時便曾指出：「香港華人之所以不積極參與政治，是基於他們的實際考慮和因為他們認定政治參與是徒勞無功的。」這結論概括了上述被訪者的心態，也同時點出了提倡公民教育的結構困境。

三、對回歸的感受

當被問及對回歸的感覺時，大多數被訪者均表示沒有甚麼特別感受，不覺得興奮也不感到憂傷，只感覺回歸那幾天有點像放假而已。然而，當我們追問九七前後對回歸的看法與心理變化時，他／她們的回應大多是無奈與憂慮兼而有之。J同學便直率地說：

說真心話，我寧願大陸不要收回香港，好害怕香港從此沒有民主自由，但現實就是回歸，現在都無所謂啦。

任職保險的Q先生則如此回答：

其實好多香港人都不想中國收回香港，但又不敢說出來，怕人說你不愛國，不是中國人，是「英國走狗」。……算了吧，回不回歸對我們影響不大，只要香港保持安定。我現在反而怕香港經濟會繼續變壞。

K 小姐則表示：

曾經想過如果不用回歸就好，如果香港不是割讓一百年而是更長就更好，但到日子越來越逼近，只覺得我們自己的影響力不大，改變不了現實。不過，其實大陸都不想香港變差。

E 先生更直接細說他對回歸的憂慮：

我好害怕回歸，怕失去自由，回歸後香港人權狀況不會太好。雖然現在香港沒有甚麼改變，但不知道將來會否改變。（我們追問回歸後是否還有憂慮）當然有，不過現在較少憂慮大陸時常干預香港。

顯而易見，不少被訪者一方面認為回歸是改變不了的事實，雖有憂慮，但也必須接受；另一方面，回歸後香港狀況並沒有太大改變，原先的憂慮因此並沒有進一步惡化，心情也相對較為安定。然而，不是所有被訪者對回歸都存有負面的態度的，例如就讀教育學院的 H 同學就有這樣的看法：

回歸總是好的，當然人習慣了這個情況（指英國統治）就不想改變，就好像很多人都不想回歸，總擔心共產黨接收香港之後不知會變成怎樣。而事實上我經常到大陸去，不覺得有問題，對我們這些小市民來說是沒有影響的。當然有市民覺得共產黨專制，但現在中國在政治、經濟上已進步很多。我自己則無所謂，中國人應該由中國人統治。

C 同學、N 同學及 P 同學都有類似看法，認為香港結束殖民地統治始終是一件好事，雖然他／她們不能清楚解釋原因。無論如何，P 同學對其在家觀看九七回歸典禮和回歸節目時的感受的憶述頗堪玩味：

沒有太大感覺，也沒有所謂高興與不高興。只覺得英國統治香港是為拿取香港的利益，而中國統治香港應該不會。

四、對香港及中國的態度

我們在電話調查部份曾經指出香港青少年較傾向認同他／她們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同時在維護自由人權及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取捨問題上明顯地傾向前者。為此，我們在深訪面談中嘗試詢問被訪者對中港兩地的印象，並試圖找出引致這些印象的深層原因。

一般而言，被訪者大都對香港印象較好，不少人認為自己對香港有歸屬感，但當被問及有否考慮移民時，近一半的被訪者均回答曾經考慮過，而且不排除移民外地的可能性，主要的原因是外地的環境較好，以及不想一生局限於一地。

至於對中國大陸的看法，被訪者大都表現出負面的傾向，而且多以「沒有禮貌」、「貧窮」、「貪污」、「專制」等形容中國大陸。當詢問他／她們這些印象從何而來時，許多被訪者都回答說是到大陸旅遊或探親時親身感受到的。以下是一些被訪者的經驗：

那次我在乘車返鄉，發覺車上的大陸人沒有禮貌，又常隨地吐啖，而公安的態度也差，覺得他們的文化水平很低。回到鄉間時從親戚口中知道在內地是要「疏通」才可以成功經營生意的。其實我的叔叔正是用這種方法才成為「暴發戶」。（A同學）

現在可能好些，但以前……現在我很少到大陸去，現在可能發展得好些。以前那些人好像都很貧苦，現在就有好多貪污，很慘。我看到我的國內親屬，有些是幹部，可以很有錢，起大屋、駕車……較為偏僻地區的人好窮……。（我們追問對國內人士的處事方法的印象）處事方面……一說到處事我就想起貪污，因為我的叔叔做過幹部，現在已去了美國。記得有一次新年，我舉家回中國大陸過年，我見到那些來我家的人不只是拜年那麼簡單。我叔叔後來說他們自動送禮

來，其實希望能從他的手中分派到一份好工作。我對中國大部份的印象都受到這次事件的影響。（我們追問對國內一些有錢人的印象）有錢人……我又會想起我叔叔，我總覺得有錢人多數都做高官，其實國內貧富都相當懸殊。（K小姐）

除了以上的一些親身經歷外，不少被訪者對中國的負面印象是從傳媒得來的，尤其是「六四事件」。Q先生回憶道：

我以往不怕大陸的，自從在電視上看見「六四」解放軍的表現，實在很害怕。……怕得哭了出來，雖然沒有人知道我會哭過，不過，從此以後我不相信大陸，他們是「講一套、做一套」的。

但也有一些被訪者的經歷是正面的，例如O先生對其某次回中國大陸進行交流活動的經驗便有如下的回憶：

那次活動使我對中國大陸大為改觀。以前以為大陸的監獄非常差，但發覺比香港還要好……（我們追問有沒有一般香港青少年對中國的負面印象）我不覺得國內人特別沒有禮貌，那些老一輩或教育程度低的人可能會較為沒有禮貌，但新一代已經很少。事實上，國內不少人（尤其是新一代）根本很像香港人，沒有溝通的困難。

由於O先生富社會參與經驗，年紀很小便參與公共事務，因此他極可能已有一套積極的人生觀，故對中國國內的看法也較為包容和正面。但無論如何，與中國大陸人士直接接觸似乎對被訪者的中國印象構成極大的影響，儘管這影響有正面也有負面，但似乎以負面居多。

在電話調查分析中處理個人背景特徵與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的關係時發現，除了出生地一項外，大部份的個人背景變項與身份認同、自由人權／國家民族均沒有呈

現顯著的關係。出生地的影響主要是香港出生的被訪者較非在港出生的被訪者傾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亦傾向認為自由人權較國家民族來得重要。究竟在大陸出生的青少年對香港本位主義、自由人權等是否確有不同的看法？若然有，差異又在哪裏？在深訪調查的樣本中，便有一位新移民的 P 同學，而她的經驗頗能為我們解答這些問題。

P 同學在廣州出生及受教育，來港只有兩年，起初以超齡生就讀中二，後因成績優異，接受訪問時已跳讀中四，但成績仍然名列前茅。因為來港只有兩年，香港文化的影響應該還未起到深刻的作用，因此頗能反映出內地青少年移民的看法。當被問及她對中國及香港的印象時，P 同學指出：

國內的人際關係很好，友誼較深厚，機心較少，香港人則機心很大，常只顧自己的利益……。（當我們表示香港人常對中國有負面印象時，她細訴了來港兩年的一番感受）唏，香港人總有這樣的偏見，以為所有大陸移民極渴望來港「搵錢」，又以為所有大陸人都是沒有教育、沒有修養的人。其實，我也不想來港，覺得廣州的生活也不錯，只是父親的意思吧了……。

（我們接著問她與香港同學的關係如何）起初，香港的同學對我是有抗拒的，幸好我會說廣東話，否則便會像我母親一樣常困在家裏。……香港學生並不努力讀書，又愛吵鬧。（她突然將話題轉到一般香港人）其實，我有時這樣想，香港人有時是怕大陸新移民的，怕的不是甚麼，而是怕他們的能力比香港人強，造成競爭，甚至威脅。在國內時我已經感到有時香港人很自大，以為甚麼都懂，而大陸人甚麼也不懂，到了香港後又發覺不是這樣。香港的經濟確是較大陸好一點，但現在大陸的情況也不差呢，其實香港人並非這麼有信心。（我們緊接著指出香港青少年大都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以及將香港的利益放在中

國利益之上，問她是否有相同的感受）我現時的同學中許多都有類似的看法，傳媒、電視劇集，甚至電台節目也一樣。這是很不對的，我一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其他人，雖然可能這是我在國內受教育的結果，但我總覺得說自己是中國人是對的，因為香港人始終是中國人，沒有理由只顧自己，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其實我與我在國內的朋友對此都有點不明白，為何香港人會有這樣的看法，總是覺得香港好、中國不好，可能是因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吧。（當我們表示香港青少年之所以害怕中國可能是由於當前中國政治制度及法治秩序較為落後，她回應道）我也承認中國現時的民主自由狀況並不令人滿意，但國內人民生活是沒有問題的，中國始終是自己的國家。

P 同學的言論究竟代表多少新移民的心聲當然是未知之數，但假如這種看法真的反映內地青少年移民的一般看法，則他／她們與香港青少年之間的鴻溝確實不小，而這鴻溝不僅對內地青少年移民融入香港社會造成困難，也將為本地出生的青少年薄弱的國家民族意識帶來挑戰。

五、對公民教育的態度

公民教育態度是今次調查的重點之一，在電話調查的分析中發現，香港青少年對加強自由人權的認識、加強香港的認同及增強思想上的批判能力等項目的重視，遠超過對加強中國的認同、加強民族教育等項目的重視，而對具體的國家符號認同教育如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和唱國歌等更存有最多的保留。在這方面，深訪面談的被訪者的回應與電話調查的結果相當一致。為了進一步瞭解他／她們如何理解公民教育與國家民族教育的關係，我們特別詢問被訪者對時下香港部份人士及團體倡議要加強愛國教育的看法。具體問題如下：「在回歸後討論公民教育時有一種提法，認為公民教育就是

推行愛國教育。首先，你認為愛國教育所指的是甚麼呢？你自己心目中有沒有理想的愛國教育？」以下是一些較有代表性的回答摘錄：

我是反對提倡愛國教育的……，我想愛國教育是指維護國家，與維護共產黨有關的，跟大陸的愛國教育沒有多大分別。（E先生）

相信回歸後公民教育一定會改變，一定會教關於共產黨的事情，反對不來的。中國說要改變，香港怎樣反對也沒有用的，不過改變不會來得太快，怕香港人反對。（追問甚麼是理想的愛國教育）愛國不可以教，自己覺得愛就會愛，不是唱國歌掛國旗就是愛國的。（Q先生）

提起民族教育、愛國教育，其實都有點害怕，好似逼你愛國一樣，好似洗腦一樣。（追問理想的愛國教育）若只教民族是甚麼或是共產黨歷史還可以，但要掛國旗、唱國歌就覺得很反感。（M同學）

我想愛國教育是用一種愛國模式去教育香港人，或者當權者認為在回歸後有此需要。（追問愛國教育的內容）其實不大清楚，……我想是教有關共產黨的事情吧。（追問理想的愛國教育）只是教授關於中國的知識是可以的，但假如在學校掛國旗、唱國歌，我不太接受，原因這裏是香港，不應掛國旗，若要唱國歌，最多是唱特區歌。（A同學）

從上述的摘錄中，不難看見，大部份的被訪者不僅反對愛國教育，而且自然而然地將愛國教育、民族教育與中國共產黨聯繫起來。我們對他／她們為何會有這樣的印象並不清楚，較為清楚的是他／她們對具體哪些人士或團體支持倡導愛國教育，以及愛國教育的內容如何等都不甚了了，因此相信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她們將國內的愛國教育印象式地投

射到香港，而一般被訪者又認為中國大陸是黨國不分的（我們發現被訪者經常將「中國」與「共產黨」互相交換使用）。就這一點而言，如果大部份香港青少年真的有如此印象，而我們又急不及待地將大陸那一套愛國教育作為回歸後香港公民教育的一個主要發展方向，則很可能因強行為之而造成青少年不必要的逆反心態。

無論如何，香港青少年有上述的印象實不足為奇，根據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所作的調查發現，即使是在公民教育最前線的教師亦有相似的憂慮：當被問及是否擔心未來的學校公民教育會變成政治思想灌輸的工具時，有超過四成的被訪教師持肯定的態度。另一個針對負責中學公民教育老師的調查也指出，接近六成的被訪者不同意在學校進行「愛中國共產黨」及「愛社會主義」的教育，該調查並作出這樣的結論：「研究結果充份顯示中學公民教育統籌主任及有關老師對將國內一套愛國主義教育／政治思想教育照搬來香港是不表贊同的。」（關注公民教育聯席會議，1997:10）

當然，以上的分析只是大多數被訪者的看法，在深訪面談的過程中，我們亦聽到另類的聲音。例如前述那位廣州出生、來港只兩年的 P 同學便有與主流頗為相反的見解。因為她的背景較為特別，我們先從她在國內受教育的背景談起。P 同學指出，國內並沒有「公民教育」這個名稱，這名稱是她到香港後才第一次接觸到的，在國內的中小學只有「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較側重制度認識，而「思想教育」則教馬克思主義等理論。「政治教育」及「思想教育」在小學已經開始，當時她覺得很「深奧」和有點「沉悶」。進入中學後（是重點學校），由於考試的需要，只好將「政治教育」及「思想教育」的內容背誦。除此之外，每星期一均有升國旗及唱國歌的儀式，其實同學之間都不太喜愛這類活動，她自己亦覺得有點「老套」，但仍然可

以接受。在這樣的背景下，她輾轉地提出了她對香港公民教育的看法：

我很贊成香港的公民教育要加強國家民族教育，這可使青年人多點認識中國。香港學生對中國實在有太多誤解，對中國有負面印象，其實這裏的老師也有不少持相同的態度，許多時只批評中國大陸，很少讚揚中國。（我們提及香港青少年可能是因為害怕共產黨）共產黨專制並不代表我們就不要愛國。（我們指出不少香港青少年認為「愛國等於愛共產黨」）兩者絕不能相提並論，我記得我的大姐在廣州就讀大專時被推薦入共青團，後來因為害怕可能真的被挑選為共產黨預備黨員而主動退出了共青團。我大姐當時認為許多人是為了自己利益才加入共產黨，她不是這類人。我們在廣州時也時常批評共產黨不是。總之，不是所有大陸人都是共產黨呀。

客觀而言，P同學雖然年輕（只有17歲），但她的觀點相當值得關注公民教育的人士深思。其實，問題的關鍵並非是應否加強國家民族教育，而是加強哪些國家民族教育。P同學成熟的地方是她將對國家民族的瞭解和關懷與「愛共產黨」教育區分開來，國家民族教育是指前者而不是後者。如果我們清楚把握這區分，並加以落實，相信提倡加強國家民族教育應該不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的。從相反的角度看，香港既已回歸中國，作為中國這一民族國家的一份子，不論在情在理，我們均很難拒絕去瞭解它、關懷它。事實上，在整個深訪調查過程中，我們發現，並沒有任何一個被訪者反對多認識祖國、多關心民族；他／她們反對的無寧是沒有反省的、沒有批判性的、單向灌輸的愛共產黨教育。這樣的區分也許仍會引起各種不同的爭議，但它畢竟源於香港的特殊歷史情境，也符合現代開放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它並沒

有反對國家民族教育，而只是替當前香港社會的國家民族教育設定一「適當」（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範疇。若然我們相信國家民族教育不能揠苗助長，這應該是在當前香港公民教育的推動中引進國家民族教育的一個務實的起點吧！

庚、結論

我們對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狀況和變化及他／她們對公民教育的態度作了初步的探討和分析。我們的發現包括：

（一）在公民意識狀況方面，通過對比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連續三年的公民意識調查，我們發現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穩定與變化兼而有之。在公民權利和責任的認知方面，他／她們特別肯定個人自由人權，並強調個人守法及盡本份的責任。至於公民態度，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態度大都傾向消極負面及犬儒主義，包括對政治人物不信任、認為政治十分複雜難明及對政府的政策感到沒有影響力，這種情況沒有因回歸後而有所改進；而對政治人物不信任則有兩極化的傾向，這現象值得注意。與此同時，香港青少年對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仍與以往一樣，抱有較積極的態度，對民主步伐的肯定亦極為鮮明，因此對青少年的公民態度絕不能簡單地以「負面」或「冷感」來概括，需要將來進一步的調查才能予以澄清。至於公民參與，一九九七年的結果與之前兩年的調查相若，青少年對新聞時事表現出頗高的關注，但在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上便顯得有點裹足不前。18歲或以上的青少年議會投票經驗十分少，而約有只一半認為自己將會於今年的立法會投票；相反，18歲以下的青少年的投票意欲卻十分強烈，儘管這意欲會否轉化成具體行動還是未知之數。

(二) 一九九七年香港青少年對九七後的香港狀況的評估較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來得樂觀，有六成多認為會維持不變，認為香港在九七回歸年後會變得更差的只有不足一成，認為更好的則有二成多，顯示出香港青少年對九七回歸後香港的看法似乎已經從回歸前那種悲觀多於樂觀的情緒逐漸扭轉過來。

(三) 至於身份認同、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之間的定位、香港本位意識及中國態度等問題，一九九七年的調查發現，香港青少年的香港本土認同仍十分強烈，同時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來得重要，這兩種情況在回歸後似乎有上升的趨勢。此外，認同香港及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重要的青少年其香港本位意識相應較高，對中國的態度也明顯傾向負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香港青少年「香港本位意識」中的本位優越心態（如「中國應學習香港」及「香港利益優先」）似有下降的趨勢，若然屬實，應有助中港之間的整合。但另一方面，贊同促進中國大陸發展的青少年較九六年有所減少，但同意港人有自治能力的青少年則有所增加。如果將後者結合上文所指出青少年不僅對香港認同及自由人權的重視皆有增加趨勢，而且對中國的態度亦趨於負面一併加以分析，則青少年當前的複雜心態對以後中港的整合也同時埋下了某種不穩定的因素。事實上，這種潛在變數已在青少年的公民教育態度中反映出來。

(四) 由於九七回歸牽涉到「再民族化」的問題，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的發展無可避免地會涉及到公民教育的討論。一九九七年的調查亦特別加闡了青少年對公民教育態度的探討。結果發現，青少年作為公民教育的受眾，他／她們認為加強對自由人權的認識、加強香港的認同及增強思想上的批判能力等項目，遠較加強對中國的認同、加強民族教育等來得重要，而對於具體的國家符號認同教育如在學校推廣

掛國旗和唱國歌等更存有最多的保留。此外，香港本位意識及對中國的態度等幾個變項與公民教育態度中有關加強本地認同的變項關係較少，但與公民教育態度中有關國家民族的變項卻均呈現顯著的關係。還有，越認同香港或越強調自由人權的被訪者，越不認為需要加強民族教育、加強對中國的認識、加強培養對中國的歸屬感、全面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唱國歌等公民教育工作。這發現從側面反映出香港青少年對那些較重視國家民族取向的公民教育政策仍存有頗多的疑慮，而這應與香港青少年較傾向認同香港及較重視自由人權有很大的關係。

（五）深訪面談調查部份基本上確認了上述的幾點結論，但也有不少的補充，包括：（1）香港青少年關注新聞時事似乎並非都是主動的，而更可能是因家庭收看而收看，而且收看的內容也以非政治性的新聞為主。（2）香港青少年在政治參與上呈現的相對「冷感」，極可能是因為他／她們感到政治參與本身無法改變「現實」而出現的「果」，而非真正的「因」。（3）香港青少年出現較強烈的投票意欲並不必然反映他／她們的高政治參與欲望，而可能是他／她們沒有將投票與政治參與聯繫起來。（4）香港青少年對香港的認同似乎是較傾向工具性的（instrumental）（在需要時可以一走了之），對中國的負面態度也同樣可能是以工具性為主要內涵（中國大陸貧窮落後）。（5）香港青少年雖然特別強調以自由人權為內涵的公民教育，但他／她們並不全然反對加強國家民族教育；他／她們反對的似乎主要是沒有反省的、不加批判的、單向的灌輸的愛國主義特別是愛共產黨教育。最後必須指出，由於這五點的發現是來自深訪面談調查的分析結果，而深訪面談並非建基於大樣本的隨機抽樣調查，有關的發現並不應視為定論，而應視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指引或參考。

參考文獻

王家英（1996），《香港人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一個自由主義的解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王家英（1997），《公民意識與民族認同：後過渡期香港人的經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王家英、沈國祥（1996），《後過渡期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全港與沙田的比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王家英、沈國祥（1997），《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 1996》。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政府統計處（1996），《一九九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香港：政府印務局。

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學校公民教育政策調查》。香港：香港政策研究所。

香港教育署（1985），《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香港：政府印務局。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6），《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香港：政府印務局。

曾榮光（1994），「非殖民化的公民教育：九七以後香港學校公民教育的構想」，《教育學報》，第 22 卷，第 2 期，頁 237-248。

曾榮光（1995），「民族教育與公民權責教育之間：過渡期香港公民教育的議論」，《教育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頁 1-26。

劉兆佳（1997），「『香港人』或『中國人』：香港華人的身份認同 1985-1995」，《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41 期，頁 43-59。

劉兆佳、關信基（1995），「關注的旁觀者：香港華人的政治參與」，《廣角鏡月刊》，第 270 期，頁 66-77。

關注公民教育聯席會議（1997），《香港中學公民教育統籌主任對民族／愛國理念問卷調查初步分析報告》。香港：關注公民教育聯席會議。

Kuan, Hsin-chi and Siu-kai Lau (1989), "The Civic Self in a Changing Polity: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Kathleen Cheek-Milby and Miron Mushkat (eds), *Hong Kong: The Challenge of Transformation*.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91-115.

Lau, Siu-kai (1994),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Hong Kong: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Asian Survey*, 34(3):243-257.

Wong, Ka-ying (1996), "The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 Liberal Explanation," *Issues and Studies*, 32(8):105-130.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

回歸後的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

摘要

本報告陳述了第三年度香港青少年公民意識調查結果。此調查受沙田區議會委託，調查工作於一九九七年十月進行。基於方法上的取長補短，是次調查一方面按照往年的方法，透過電話隨機訪問了全港 1,035 位年介 15 至 24 歲的青少年，另一方面以深訪面談形式，附訪了沙田區同年齡層 17 人。結果發現：（一）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穩定與變化兼而有之，在公民權利與責任的認知方面，他／她們特別肯定個人自由人權等權利，並強調個人守法及盡本份的責任。至於公民態度，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態度大都傾向消極負面及犬儒主義。與此同時，香港青少年對投票是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最有效方法仍與以往一樣，抱有較積極的態度，對民主步伐的肯定亦極為鮮明。至於公民參與，一九九七年的結果與之前兩年的調查相若，青少年對新聞時事表現出頗高的關注，但在社會參與及政治參與上則顯得有點裹足不前。（二）香港青少年在一九九七年對回歸後香港狀況的評估較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時來得樂觀，而且似乎已經從回歸前那種悲觀多於樂觀的情緒逐漸扭轉過來。（三）香港青少年的本土認同仍十分強烈，同時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來得重要，這兩種情況在回歸後似乎有上升的趨勢。（四）一九九七年的調查特別加闡了青少年對公民教育態度的探討。結果發現，青少年認為加強對自由人權的認識、加強香港的認同及增強思想上的批判能力等項目，遠較加強對中國的認同、加強民族教育等來得重要，而對於具體的國家符號認同教育如在學校推廣掛國旗和唱國歌等更存有最多的保留。（五）深訪面談調查部份基本上確認了

上述的幾點結論，但也有不少的補充，包括：（1）香港青少年關注新聞時事似乎並非都是主動的，而更可能是因家庭收看而收看。（2）香港青少年在政治參與上呈現的相對「冷感」，極可能是因為他們感到政治參與本身無法改變「現實」而出現的「果」，而非真正的「因」。（3）香港青少年出現較強烈的投票意欲並不必然反映他們的高政治參與欲望，而可能是他們沒有將投票與政治參與聯繫起來。（4）香港青少年對香港的認同似乎是較傾向工具性的，對中國的負面態度也同樣可能是以工具性為主要內涵。（5）香港青少年雖然特別強調以自由人權為內涵的公民教育，但他／她們並不全然反對加強國家民族教育；他／她們反對的似乎主要是沒有反省的、不加批判的、單向的灌輸的愛國主義特別是愛共產黨教育。

Civil Awareness of Young People in Post-1997 Hong Kong

Timothy Ka-ying Wong
Kwok-cheung Shum

Abstract

This report presents the findings of the third annual study of the civil awareness of Hong Kong's young people in October 1997 after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ese sovereignty. The survey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Shatin District Board. We first randomly telephone-interviewed 1,035 young people aged 15-24 from Hong Kong as a whole, and later, for supplementary purpose, we interviewed face-to-face in depth another 17 persons from the Shatin District. Our findings include: (1) young people's civic awareness contains the aspects of both stability and change. On civic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like in 1996, the young in 1997 still emphasized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obeying the law and fulfilling civic obligations. On civic attitudes, they were still rather negative and cynical, and even more so when compared with 1996 and 1995. Nevertheless, they continued to regard voting in an election a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 to government and expressed a strong desire for the direct election of the SAR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ure. On civic participation, similar to 1996 and 1995, young people in 1997 displayed a strong concern for daily news and events on the one hand but a weak one for actu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2) Over the year,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post-1997 Hong Kong continued to improve and for the first time expressed more optimism than pessimism. (3) Although Hong Kong had returned to China, similar to 1996, the young people still maintained a strong indigenous identity and believed that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local interests,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national and state interests. (4) The 1997 survey also explore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he future of civic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y felt the need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on civic values and local identity while being skeptical

of education emphasizing unilater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5) The in-depth interview study basically confirms the above findings of the telephone survey; yet it also produces the following insights for future study reference: a) the young people's concern about daily news and events might not be a reflection of their active pursuit, but because their family watched the TV news and so they did passively; b) their political apathy might not be the cause of their weak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ut the result of Hong Kong's conservative political reality; c) that they valued voting might not be a sign of their strong desire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ut came from their not seeing voting 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 the ambivalence of their strong indigenous identity and weak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state might be a result of instrumental reasoning instead of emotional attachment/detachment; e) they might not oppose national education; they might only oppose national education attempting to indoctrinate an uncritical accept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30.00

ISBN 962-441-078-X